

传播仪式观视野下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在场”新意涵 ——以南方某省王村新农村建设为中心

汪佳豪, 邱新有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本文基于南方某省王村新农村建设的实地考察,以传播仪式观为视角对王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村神在场”“村民在场”和“精英在场”进行具体分析,分别发现“敬如神在”“有效监督”和“魅力权威”的传播效果。文章认为“在场”的有效整合,既可以推动乡村内生性力量向治理资源的转换,也可以促进村民参与式治理的进程,更可以形成乡村治理核心的再造。在学界多种视角讨论“在场”概念的基础上,聚焦于仪式化传播视角,更能合理化地凸显“在场”作为秩序或制度生成逻辑基础的理论意涵。同时,在制度环境的框架下,“在场”对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路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在场; 传播仪式观;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0)06-0126-09

The New Connotation of “Presenc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seminating Function

——Centered o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f Wangcun in a Southern Province

WANG Jiahao, QIU Xinyou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of Wangcun in a southern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illage god presence”, “villagers presence” and “elite presence” in the process of Wangcun’s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seminating function, and finds there is the communicative effect of “respect as God presents”,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charm authority”.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resence”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ndogenous power to governance resources, but als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of villagers, and also form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of rural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presence”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in academia,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and rationall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presence”. Focus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ized communication, it can more rationally highlight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presence” as the logical basis of order or system gen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resence”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governance path in Chinese rural society.

收稿日期: 2020-08-10

作者简介: 汪佳豪(1995-),男,江西贵溪人,传播学硕士,江西师范大学职员。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社会传播。

邱新有(1964-),男,江西贵溪人,传播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社会传播。

Key words: presence; disseminating function; rural governance

一、已有的文本与本文的问题

(一) 问题的来源

2018年年初,王村的新农村建设项目正式立项,由乡政府牵头组建了村民理事会负责具体的项目建设。但在其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新农村建设项目停滞不前。2018年8月,王村召开村民大会,重新改选了村民理事会,以舒某为首的新任理事会成员登上了村庄的历史舞台。在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之后,他们开始对治理策略进行调整,推行了三项治理新举措。

第一,新修了一条通往“村神”庙的水泥路,并在修筑完成后举行了一次“村神”祭祀活动。

第二,将村民小组长纳入新农村建设项目组,负责日常施工的监督工作。

第三,以舒某为首,村民理事会成员采取了不同于上届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舒某每天雷打不动地早早到达施工现场,对建设项目事无巨细样样过问。

在此之后,王村的新农村建设出现了转机,以往面临的重重困难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那么为何舒某等人实施的三项治理举措能有效解决王村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困难?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对王村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二) “在场”与传播仪式观的文本

任何个案的研究,都试图指向更深层次的学术命题。基于田野调查中的问题意识,我们发现如果将王村看作是一个传播场景,那么舒某等人的治理新举措都呈现出相同的特点,都试图将不同的传播主体纳入这个传播场景之中。换句话说,王村治理的新举措促成了村神、村民和以舒某为代表的乡村精英的“在场”。由此我们可以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在场”的研究领域内。

一直以来,多学科关注“在场”理论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它们从多个视角赋予“在场”丰富的内涵。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场域”这一概念的阐释中就隐含着“场”的描述,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占据了特定的位置就意味着把持着场域中特定的权力。”^{[1] (p122)}在这里,场域中不同主体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意味着个体在这个位置中的“在场”。而这些“在场个体”则是场域中关系网络的一个节点,它使场域中不同个体得以连接。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关于“在场”的论述中,也有对“在场个体”连接作用的强调,他以身体“在场”为核心,认为在情境性的空间中,身体的“在场”起到了时空的连接作用。^{[2] (p60)}他强调“我的身体作为将被看见的器官—即是说:知觉我身体的一部分。”^{[3] (p312)}在他看来,身体是自我与知觉的主体,在这里,“在场”的身体成为感知意义符号的器官,而意义的符号又统一于身体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身体的感知是身体连接与通达世界的关键。这一点,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同样强调“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并将身体作为介质与外部世界进行感知互动。他在阐述“共同在场”概念时曾说过“共同在场是以身体在感知与沟通方面的各种手段为基础的。”^{[2] (p60)}

当我们以传播学的学术视角审视以上学者的论述,便不难看出以往关于“在场”的研究,大多将“在场个体”作为联结性的、介质性的传播主体,作为感知与传播意义符号的基础。这些观点有着明显的传递观偏向,这使学界对“在场”这一概念的理解始终停留在信息跨越空间的传播上。在这一点上传播学者彼得斯(Peters)也曾表达过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身体在场”除了具有符号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有在媒介传播之外的特殊含义。“面对面身体在那里存在本身就显示了某种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意义上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和善意。”^[4]也就是说,只要保证身体的“在场”,至少表明我愿意和你在一起,我把自己这段时间排他性地让渡给你,这是传播得以发生的最基本的前提,参与双方能够确认的东西。^[5]在信息传播之前,身体的“在场”就确认了“在场”双方之间的某种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彼得

斯的观点似乎与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有某些共同之处。

詹姆斯·凯瑞(Carey J.)将传播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与传播的仪式观。传播的传递观将传播定义为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发布的过程,这一表述强调的是信息跨越空间的传递。正如杜威所说“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6] (p5)}所以,单纯聚焦于信息的传递,必定会遗失传播的仪式观向面。

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息的表征。^{[6] (p7)}此时的传播就如同一种将团体或共同身份的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其作用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确认一种基本的秩序,表明一个传播实践活动的过程。他以报纸为例,在传播仪式观下,读报更多的不是指信息的发送或获取,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场弥撒仪式。在这种场合下,特定的世界观得到描述与强化,这时我们面对的不是讯息的效果或功能问题,而是报纸的呈现或“在场”在构建读者生活与时间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为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6] (p9)}同读报一样,在具体的传播实践活动中,个体的呈现或“在场”也是提供及确认生活形式、秩序、调子的关键。有学者就表示如果传递观主要是一种线性模式,那么仪式观主要是一种“场”模式。^[7]在凯瑞看来,当将报纸的“在场”置于仪式观的隐喻下时,仪式首先是一种控制混乱、形成秩序的方式。^[8]

由此,我们发现在传播仪式观的视野下,“在场”这一概念有了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的研究。传播学者郭建斌对川藏地区百姓看电视、看电影等活动进行考察后,把“在场”作为一种对以上传媒活动进行阐释分析的概念,认为“在场”指的是由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构筑的时空中的一种“结构化”存在及其象征意义。^{[9] (p2)}在这里,郭建斌将尼克·库尔德里和安娜·麦卡锡等人的“媒介空间”^{[10] (p1-2)}概念、吉登斯的“结构化”^{[12] (p352)}理论、詹姆斯·凯瑞等人的“仪式化”^{[6] (p5)}分析手段融入了“在场”这一概念中。^[11]他同时提出国家通过各种媒介传播政策实施达成的“在场”就是一种治理的形式。但正如前文所述,站在“结构化”的视角上,“在场”这一概念的内涵始终逃不出信息传授的传播传递观偏向。而将“结构化”理论与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相融合是否合理?本文认为还有待考量。就这一问题郭建斌也曾表示,“如此丰富的理论意义加載在‘在场’概念上,我自己也有‘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11]

(三) 本文的问题

综合国内外学者相关的学术成果,学界围绕“在场”概念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理论基础、研究视角等方面为本文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当然,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

在理论上,以往关于“在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的延伸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在研究视角上,一方面,以往关于“在场”的研究多以政治学、社会学为主,传播学视角的力作总体上偏少。另一方面,虽然传播学界已有研究者尝试将“在场”概念放置于传播仪式观的视野下,但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关于“在场”讨论只停留于传递观偏向的事实。

基于以上的论述,本文将通过南方某省王村的实地观察,从传播仪式观的视角出发,探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在场”问题,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对“在场”这一概念的理解。同时,本文也将对以下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在传播仪式观的视角下,“在场”这一概念新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在场”对乡村治理有何现实意义?

二、田野与个案的浅描

王村位于南方某省东北部,是以丘陵地形为主的自然村,距行政村溪村3公里,距乡政府5公里,距市区13公里。现有水田面积1200亩,旱地面积3000亩。村民主要收入为外出务工及农业收入,2017年村民人均年收入为18000元。村中有王姓与舒姓两族,共有村民226户,合计875人。二十世纪中期,王、舒两族以一条横跨村庄的水渠为界分开居住,但现在村中两姓早已混居在一起。

2018年初,王村开始进行新农村建设项目,项目由王村所在乡党委书记挂点,溪村村委会干部为项目负责人。由于王村在其所在乡镇属于人口较多的自然村,所以乡政府极为重视该村的新农村建设项目,由此王村被特批为新农村建设“精品”试点村。根据王村新农村公建项目公示栏显示的信息,王村的新农村建设分为休闲广场、风景塘、排水沟建设、粉刷裸墙、空闲房拆除、村庄亮化、环境整合、主干道修筑、次干道修筑、支干道修筑等11个子项目,共计预算拨款3879918.17元。不得不说,王村的新农村建设项目在行政人员配置、资金投入等方面都是当地的最高标准,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王村百姓都深知具体建设的困难。虽然乡政府下派了村委会干部作为项目建设的负责人,但王村大部分的村民都很难接受外村人来插手王村的新农村建设项目:“王村的事情还是要王村人自己说了算,别人搞不来的。”所以即便是村委会干部也很难对这次新农村建设开展行之有效的工作。事实上,王村的治理现状并不乐观,村中并没有能够组织起各方的力量。

基于上文的原因,在新农村建设项目立项后不久,就由乡政府牵头在王村成立了村民理事会来具体负责项目进程。乡政府试图借此将王村的治理力量进行重新整合,但是项目建设初期乡政府的这一努力并没有显现出很好的成效。首届村民理事会理事长王某长期从事建筑承包行业,在当地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并且与乡政府有多次建设施工上的合作,所以,此次选出的村民理事会成员大多和他关系很近,宗族和村小组长的力量一定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这样,一方面使村中的新农村建设缺乏有效监督,村民反映连搅拌水泥都是在少有人去的村后山进行。另一方面缺少来自村庄内部的“主心骨”。在施工进行了数月之后,村民发现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于是由村小组组长牵头组织村民进行了一系列的上访活动。最终使王某为首的8位村民全部退出村民理事会,重新组建了以舒某为首的新村民理事会。舒某常年在外地务工,社会阅历丰富。加上他多次为村小组长组织的上访活动出谋划策,许多村民对他的办事能力赞赏有加。在成立新村民理事会时,舒某顺势被推选为理事会理事长。虽然村民理事会进行了大换血,但是,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村中长期形成的治理无力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王某等人对“被告”一事耿耿于怀,时不时地会来项目建设工地“找茬”,这给项目施工带来了很多附加的困难。

为此,新任村民理事会在王村实行了本文开篇所述的三项“在场”新举措,站在传播仪式观的视角下,这三项举措都显现出仪式性事件的特征,本文所说的仪式性事件中的“仪式”并不等同于我们日常理解的节日仪式,如同凯瑞将传播过程看作是一场弥撒仪式,本文主要在类比的层面使用“仪式”。^[12]由于三项治理举措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村的治理现状,所以关于“在场”的仪式性事件也成为笔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我们先后三次进入王村进行田野调查,与王村村民同吃同住,共计80余天。此过程中,与王村村民理事会、村民小组组长以及其他村民建立了较好的联系,并同他们进行了十多次的深度访谈,以此对王村新农村建设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笔者大部分的时间都蹲点在王村新农村建设的施工现场,实地观察村庄治理的过程。同时也深入乡村社会倾听观察村民的日常交流,形成了40余小时的录音资料,50余张现场照片资料和许多第一手资料。

(一) 村神在场——敬如神在

在文化信仰上,王村的村民大都信仰“社公神”。“社公神”对王村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是一种以村落为基础的地方性文化信仰。在村民看来,虽然各村都有本村的“社公神”,但王村的“社公神”只保护王村的百姓。2016年,因为“社公神”庙老化严重,村内集资修建了一座新的“社公神”庙。

为修建“社公神”庙,村里每户出资四百元,后期因为资金不足又由村里的百姓自发捐款七千余元。因此还特地在“社公神”庙前为后期捐款的百姓竖起了一尊功德碑。有趣的是,筹集资金的过程异常顺利,大家不像以往那样一听到要交钱就畏畏缩缩,那些多出钱的村民都是主动地多捐。村民认为自己多捐了钱,“社公神”都看得到,这样就能更多地受到“社公神”的庇护。村民自发捐款中最高的一笔款项数额为2800元。在人均年收入只有18000元的王村,这样的捐款数额是非常少见的。

长期以来,村里人都相信庙中的“社公神”掌管着村中百姓的日常生活。王村每年的大年初一都会举行盛大的“社公神”祭祀仪式。村里的锣鼓队一大早就会在村中敲响“家伙事儿”,号召村民聚集起来参加“村神”祭祀仪式(这寓意着好运从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村里的老老少少都会带着自家的烟花爆竹以及祭品,在锣鼓声中缓慢前行,一同赶往“社公神”庙。祭祀仪式开始后,“社公神”庙前的小广场会摆满烟花爆竹,燃放产生的烟雾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与此同时,“社公神”庙前的香炉会密密麻麻地插满各家的香烛,队伍后面的村民有时甚至找不到空位,只能将香烛插在一旁地砖的缝隙中。据村民说,以前的祭祀仪式比现在还要盛大,有些家庭甚至将自家的牛牵去参加祭祀。这是一项全村人都会参与的古老文化仪式,也是村中唯一能将王、舒两姓的人完整地聚集在一起的村庄集体活动。用村民的话来说,“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姓舒、姓王,大家都是王村人了”。

新任村民理事会的理事们深知“社公神”庙对王村的重要性,所以,舒某等人上任不久就决定新修一条通往“社公神”庙的马路。而前任理事会并没有将这条路纳入新农村建设项目规划中,对此,许多村民愤懑地表示“我们王村这么大的村子,正月里发头去‘社公庙’还要穿套靴去?”南方地区年初多雨,此时村民前往祭祀的道路通常泥泞不堪,要穿雨靴才能通行。12月5日,“社公神”庙公路开始动工,舒某等人将今年祭祀村神的事情,早早地通知了村中的村民。仪式前夕,工地旁便聚集了许多前来参加仪式的村民,村中的锣鼓队在一旁敲锣打鼓,闻声而来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当最后一车水泥浆倒进路基时,祭祀仪式随即开始,大家将事先准备好的烟花爆竹全部点燃,并纷纷在庙前点香烧纸,作揖祭拜。最后居住在附近的几家村民将早早准备好的吃食提到新修的公路旁,大家一起吃点心庆祝,邻村的村民路过时都说“噢!难得!王村办事还有那么齐心。”王村的一位老人表示,“王村已经很久没有办过这样的大事了,记得还是人民公社时才有这般的活动”。

“村神”作为全村百姓的共同文化信仰,长期以来在构建王村的乡村社会秩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村头的“社公庙”时刻提醒着村民,王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供奉着同一个神灵。这使“社公庙”的祭祀活动带有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属性,在举办“村神”祭祀仪式时,“村神在场”使村中的村民聚集在一起,长时间浸润在这种文化的传播仪式之中,使村中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敬如神在”。以此凝聚了人心,整合了王村的社会秩序。“要为家里想,这是子孙后代的事,会错不?一句话,就是要把村里的事办好,这是王村每个村民都希望的事,会错不?”无论村民之间有着何种矛盾,在此时王村百姓都意识到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原本因为宗族亲缘的关系,难以聚拢的村民,也“齐心”想“把村里的事办好”,想把新农村建设好。

(二) 村民在场——有效监督

王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有8位村民小组长,被推选做小组长的村民,常年在家中务农务工。他们在各小组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村民眼中,村小组长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村中的村民。但这一点却并没有引起前任理事会的重视,一位村小组长就和笔者说“当时王某就说,这个和你们不搭架的,他们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们就急伤了,要把我们看起点嘛!”王某等人不仅不让村民入场,甚至还有点瞧不起村中的村民,这就使村民无法深入地对施工项目的质量进行监督,导致了前期新农村建设项目的质量问题在施工近一个多月后才被发现,近40万元工程款打了水漂。另一方面,广大村民同村民理事会之间也产生了很大的嫌隙,在新农村建设的事情上,村民理事会难以聚起人心。

新任理事会上台之后,舒某等人主动将村小组长纳入项目建设队伍之中,负责日常的监工及账目审核工作。但据村小组长讲述,他们在轮值监工上并没有那么勤快,“我们小组长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懂吧!但是理事会有什么一定要拉着我们,不然他们做不成的”。据我们在村中的观察,村小组长出现在工地上监工的时间明显少于理事会成员,即使在工地上也是同村民聊天,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但现在王村的村民对工程项目的担忧却减少了许多,“天天在一起都看得到的,还怕什么”。说这样话的村民其实并没有经常去工地查看工程质量,但是,村民代表已经进入项目建设队伍,这给王村的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老百姓对理事会工作的抵触也减少了许多。“村民在场”使村中百姓得以聚

集,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持续监督的仪式性文化传播场景,这种有效监督的文化模式得以被仪式中的村民共享。这不仅确认了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还重构了村民与理事会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共同协商,有效监督的良性秩序。

理事会成员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村民监督的压力。舒某等人多次向村民表示要保证工程质量,并且会增加许多原来没有的工程项目,包括一个休闲广场、两个风景塘、一个村礼堂、两条通向“村神”庙的公路。舒某说“做这个事一起看得到的,做不好要挨骂的。”

(三) 精英在场——魅力权威

新任理事会的负责人舒某常年在外务工,在村里呆的时间并不多。因此,项目建设初期,舒某在村中的威信并不高。据笔者观察,因入户路修建的问题,村中的妇女曾几次同其发生争执,并在争执的过程中对其毫不客气。在中国乡村,传统政治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仍旧存在且深刻影响着现今中国人的行为,人们的文化心理与个性仍然有“臣民”特性。^[13]同样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乡村治理直接面对的是村中的老百姓,在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过程中,有贤德有威信的乡村精英往往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舒某在村中威信不高,正是新农村建设工作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前任村民理事会的负责人王某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他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行事较为霸道,许多村民对其意见很大,甚至公开表示“什么事都是你说了算,你想当王村的土皇帝呀!我就不服气。”除此之外,在处理许多项目建设事宜时王某并不会亲自到场,而是指派其他理事会成员去做。

为了树立威信,舒某购置了一辆电动助力车,他每天骑着这辆车穿行在村中的各个角落。可以说,在王村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舒某是时刻在场的。据村民描述,他每天必定第一个来到施工现场,在工地上“吆五喝六”指挥着工人施工,但是,舒某对建筑行业并不是十分懂行,建筑工人时常私下说其根本不懂,在那瞎指挥。笔者曾对舒某指挥的场景进行过记录:11月13日上午8时许,我们来到村头的施工现场,一眼望去,便见三组人马。一组人马是施工队的工人,一组人马是前来看热闹的村民,最后一组人马则是在指挥监督施工的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中派头最大,说话最多的便是新任理事会理事长的舒某,此时施工队刚来不久,还未正式开始施工。舒某便扯着嗓子喊道,“还不开始做事呀!这里年底就要结束的,我早上六点钟就打电话给老邹(工地包工头)了”。走到昨天新铺的水泥路旁时,舒某又喊道“老师傅啊!这里切阔了,三米一切,这里切都没切,这里快点拉机子过来切咯!”一旁的工人嘀咕道“你不要乱说话哟,三米一切?”称其“不懂还瞎指挥”。一般的村民并不清楚舒某指挥得对不对,他们看到的是舒某每天到工地最早,在工地上“说话算数”,对工程质量最上心。

其实舒某在工地上发出的指挥信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每天的“在场”。在作为乡村精英的舒某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上文仪式般的场景时,他的“在场”也聚集了具有共同身份的村民,时间上维系着一种权威领袖式的仪式性文化传播场景,使村民在仪式中感受到了舒某克里斯玛式的领袖魅力,重构舒某与村民之间的社会秩序。在村中,他逐渐树立了“说话算数”,“处事公平”,对新农村建设工作上心的好形象。慢慢地,舒某逐渐成为理事会中“领袖”般的人物,成为处理村中事务的核心。之后,每当理事会与村民发生争执时,村民便会抛开其他理事会成员,凑到舒某旁与其商量,经过一番私语,争执往往都能得到解决。

三、“在场”的绩效分析

在王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场”能有效整合乡村的社会秩序,形成“敬如神在”的传播效果,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有效监督”,并且树立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魅力权威”。“在场”能有效整合乡村社会的秩序,形成乡村有效治理的良好局面,使得“在场”概念对乡村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的解释力。

(一) “在场”推动了乡村内生性力量向治理资源的转换

一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就具有血缘性或地缘性村落特征。这决定了乡村社会主要依靠内生性力

量进行自我治理。^[14]而王村隶属的溪村村委会由多个自然村构成,且各个自然村分布较散,导致其血缘性与地缘性特征不强,从而难以在治理中利用传统的村庄内生性力量。反观王村村民理事会的治理过程,充分利用村中村民共同的文化信仰——“村神”,通过“村神在场”使村中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在时间上浸润在这种文化的传播仪式之中,使得村中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敬如神在”,整合并确认村中崇敬“村神”、众志成城的社会秩序。以此突破村中治理的困境,使村中传统的内生性力量转化为实践中的治理资源。

(二)“在场”推动了村民参与式治理的进程

乡村治理的主体理论上应该是广大村民。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村民手中的治理资源匮乏,村民的主体地位往往被取代,村民难以参与村里的治理过程,使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当前,国家正在推行村民参与式治理,通常办法是增加他们在现实中的实际利益,但是这样做的效果往往难以持续。而王村因为其自然村的地域特性,让小组长全程跟踪项目,形成了“村民在场”,实现了“有效监督”的目标。实际上,王村的这种参与式治理,在时间上形成了一种持续监督的仪式性文化传播场景。一方面,村民能够持续地参与事件的过程,另一方面,还能在仪式化的过程中共享有效监督的文化模式。这一过程提高了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了村民的知情权与主体意识,而且这种仪式化传播过程所增强的主体意识是内化于心的。

(三)“在场”推动了乡村治理核心的再造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格局表现为“双轨政治”。^[15](p10-28)一条是行政体制的轨道,以体制内的官员为核心。一条是基层自治轨道,以体制外的乡村精英为核心。在乡村社会治理中,重视对乡村精英的利用,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16]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对中国政治制度背后精神与思想的深远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与个性仍然有“臣民”特性。^[17]所以,一个具有权威的乡村精英往往能对村庄治理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传统的乡绅阶层逐渐没落,体制外的乡村精英难以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乡村治理核心的再造迫在眉睫。王村的村民理事会成员就是乡村精英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生活与工作都深深扎根于本村,他们的“在场”能够聚集具有共同身份的村民,在时间上维系了一种权威领袖式的仪式性文化传播场景,使村民在仪式中感受到舒某克里斯玛式的领袖魅力,继而重构其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在村中形成了一种尊敬“领袖”的社会秩序,这是在传统乡绅逐渐没落背景下乡村治理核心的再造。

四、总结与讨论:传播仪式观视野下的“在场”

詹姆斯·凯瑞开创性地将传播分为传递观与仪式观两种类型,所以,在传播学的视角下,“在场”这一概念必定存在着多元化的意涵。其中传递观的面向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通过王村案例的分析,本文认为“在场”的仪式观面向具有更加重要的理论意义。有学者把这一面向的“在场”意涵称为“媒介传播不可替代的仪式意义”。在这一视角下“在场”个体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意义的传播,还具有整合并确认秩序的机制内涵。具体表现为“在场”个体使具有相同身份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并在时间上浸润在某种文化的传播仪式中,从而得以整合并确认某种基本的社会秩序。同时,在制度环境的框架之下,“在场”对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路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仪式化传播的“在场”

让我们回到杜威的那句经典表述“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詹姆斯·凯瑞在这句表述的启发下,认为不仅要关注传播信息、传播渠道等相关问题,还应该关注传播行为本身。在王村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关于村庄公共事务的信息通过村内各种结构化传播网络穿梭于王村的各个角落。这些信息固然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沿着拉斯韦尔的脚步,我们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也可以对信息的传播渠道进行梳理等等。但我们在王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有比“说什么?”“是谁说?”“怎么说?”等显得更有意义的现象值得思考。以王村的“村神”为例,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村神”只是一座树在村中的石头雕像。那么为什么不会说话的“石头雕像”能成为大家

趋之若鹜的“村神”?王村的百姓在日常生活之中为什么会对其“敬如神在”?根本的原因就是“村神”的“在场”与循环的仪式化祭祀活动,构筑了詹姆斯·凯瑞所说的“共享信仰的表征”,这种共享信仰的表征在仪式化的循环中被村民“神化”了,并最终确认了下来。这种共享表征的信仰确认使村民的链接得以实现,这就是村庄秩序、村庄社会得以整合建构的内在逻辑。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王村的“村神在场”“村民在场”“精英在场”实质上就是传播实践主体的“在场”,他们的“在场”本身就可以表明很多问题,某种共享文化信仰的表征(秩序)就蕴含其中,在仪式化的过程中这种表征或秩序得以确认。同样,这是王村村民得以有效监督新农村建设的,王村精英的魅力权威得以形成的内在原因,也是“在场”作为一种仪式化传播的内在逻辑。

基于此,本文也认为“在场”是一种仪式化或象征化的存在。但本文与文献部分提及郭建斌教授关于“在场”概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郭建斌教授认为“在场”不仅具有象征性意义,也是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在这里他认为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缺少具体制度环境的约束,而传播的传递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结构化制度视角的特征。^{[9] (p13)}他试图借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统一于两者生产与组织的动态过程之中,将传递观与仪式观统一于“在场”概念之中。本文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诚然,传播学作为一门贯穿社会信息系统的科学。^{[18] (p8)}必定如同“结构化”理论所述的那样,具有“结构二重性”的特征。它既可以聚焦于传播主体、传播形式,也可以聚焦于传播信息、传播结构。这也是詹姆斯·凯瑞得以将传播分为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原因。因此,当我们面对任何传播活动时都能以这两种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分析。当我们聚焦于传播主体本身时,传播主体也必然进行着某种信息的传递。正如瑞凯所述,这两种传播观并不需要互相否定,传播仪式观并不排除信息传递或态度转变的过程。^{[6] (p10)}基于上述讨论,传播具有仪式化与结构化的双重特征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传播既能指向传播的主体,又能指向传播的信息结构。那么,能否将上述观点的主体从传播延伸到“在场”(也就是郭建斌教授的观点),关键在于“在场”是否具备上文所述的双重指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场”指向的只是传播实践的主体。以往的研究者能以传递观审视“在场”概念,仅仅是因为“在场”的传播实践主体能够进行信息的传递,他们只是将“在场”个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与前提。所以与其说他们以传递观或结构化的视角讨论“在场”,不如说是以这个视角讨论“在场”个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因此,将作为秩序或者说制度环境形成基础的“在场”,聚焦于仪式化传播的视角之下是更为合适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郭建斌教授的这一思考是很有价值的。“在场”作为秩序或者说制度环境形成的逻辑基础,其与制度环境下的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认为要讨论这一问题,必须将“在场”放置于制度环境的框架之下。

(二) 制度环境框架下的“在场”

任何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环境都需要经过体制内嵌入性制度与体制外内生性制度的磨合,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修正改进。一旦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力量形成失衡状态,国家制度就会与现实社会脱嵌,这会对现实的社会生活造成难以预估的破坏。正如埃文斯所说,一旦国家力量没有嵌入社会,则无法获得私营部门的信息反馈和社会资源的充沛补足,国家的利益整合功能无法有效实现。^[19]这使得国家制度期望形成的治理意图难以达成。而在中国乡村社会,内生性制度力量的缺失由来已久。

王村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乡村治理,可以看作是一次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磨合。不同于管理单纯强调上对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治理强调的是各种参与部门之间的平等互动,是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各种组织等等之间的一种交叉互动的平等关系。^[20]政府在王村组织成立了村民理事会,就是期望借此达成上述的平等互动关系。从而顺利地完新农村建设项目,使国家层面的政策意图得以实现。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政策与王村社会之间似乎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平等互动。前期的建设过程一定程度上是依靠政府权威将体制内的嵌入性制度相对机械地贴合在王村的社会环境之上。王村的文化信仰、村民代表一定程度地被排除在外,乡村精英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国家制度与现实社会环境脱嵌的局面,乡村善治也就无从谈起。

在传播仪式观的视野下,“在场”作为秩序或者说制度环境形成的逻辑基础,使王村社会内生性的制度力量被重新激活。王村的“村神在场”使这种存续于村庄社会的文化力量作用在村庄治理的实践之中,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民之间的关系,使原本松散的村庄秩序得到了有效的整合。王村的“精英在场”使得克里斯玛式的魅力权威加身于乡村精英,他们应有的正面力量得以在治理过程中充分展现,以此重塑了乡村治理的核心。而“村民在场”使村民得以真正参与王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持续监督机制。以上所述都是通过整合“在场”的仪式性文化传播场景,从而在仪式化的过程中使村民与村民、乡村精英与村民、村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某种新的秩序,使原本没落的内生性制度力量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场”使王村的内生性制度与嵌入性制度达成了凡勃仑所说的制度性力量的某种平衡。在凡勃仑看来,这种平衡达成,制度的变迁就会显现出它的历史延续性,也就是说在历史的维度中体制内外两种制度理论上能自主地形成互动,并最终使体制内的制度嵌入到社会环境之中。^{[21] (p188)}从这个意义来说,传播仪式观视野下的“在场”的有效整合对中国乡村治理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法〕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3]〔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4]Kane, C. L. & Durham Peters, J. (2010). Speaking into the i Phone: An interview with John Durham Peters or ghostly cessation for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2): 119–133.
- [5]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9(2):37–46.
- [6]〔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7]郭建斌.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J].中国传媒报告,2006:50–59.
- [8]胡翼青,吴欣慰.再论传播的“仪式观”:一种社会控制的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15(5):114.
- [9]郭建斌.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 [10]Nick Couldry, Anna McCarthy. MediaS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J].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11]郭建斌.“在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媒体人类学概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11):39–53.
- [12]郭建斌.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J].国际新闻界,2014(4):6–19.
- [13]邱新有,吴佩芝.协商民主与“金字塔”伦理道德系统——对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原因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25–31.
- [14]徐勇.中国农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8):102–123.
- [15]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 [16]杜蛟.村治主体的缺位与再造——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理事会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7(5):32–45.
- [17]邱新有,吴佩芝.舆论表达与协商民主——基于古代中国议政的分析[J].现代传播,2015(1):28–40.
- [18]郭庆光.传播学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19]彭勃,杨志军.发展型国家理论、国家自主性与治理能力重塑[J].浙江社会科学,2013(6):58–65.
- [20]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38.
- [21]〔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陈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余小江)